

司馬遷評傳



中国历史人物丛书

司馬遷評傳

肖黎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俞慈韵

封面设计：姜 凡

司 马 迁 评 传
肖 黎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³/₈印张 6插页 267,000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850册

统一书号：11437·38 定价：2.65元

司馬遷評傳

周谷城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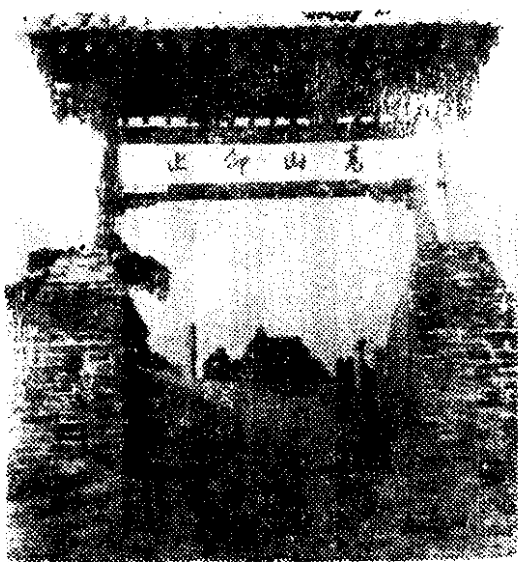




司马迁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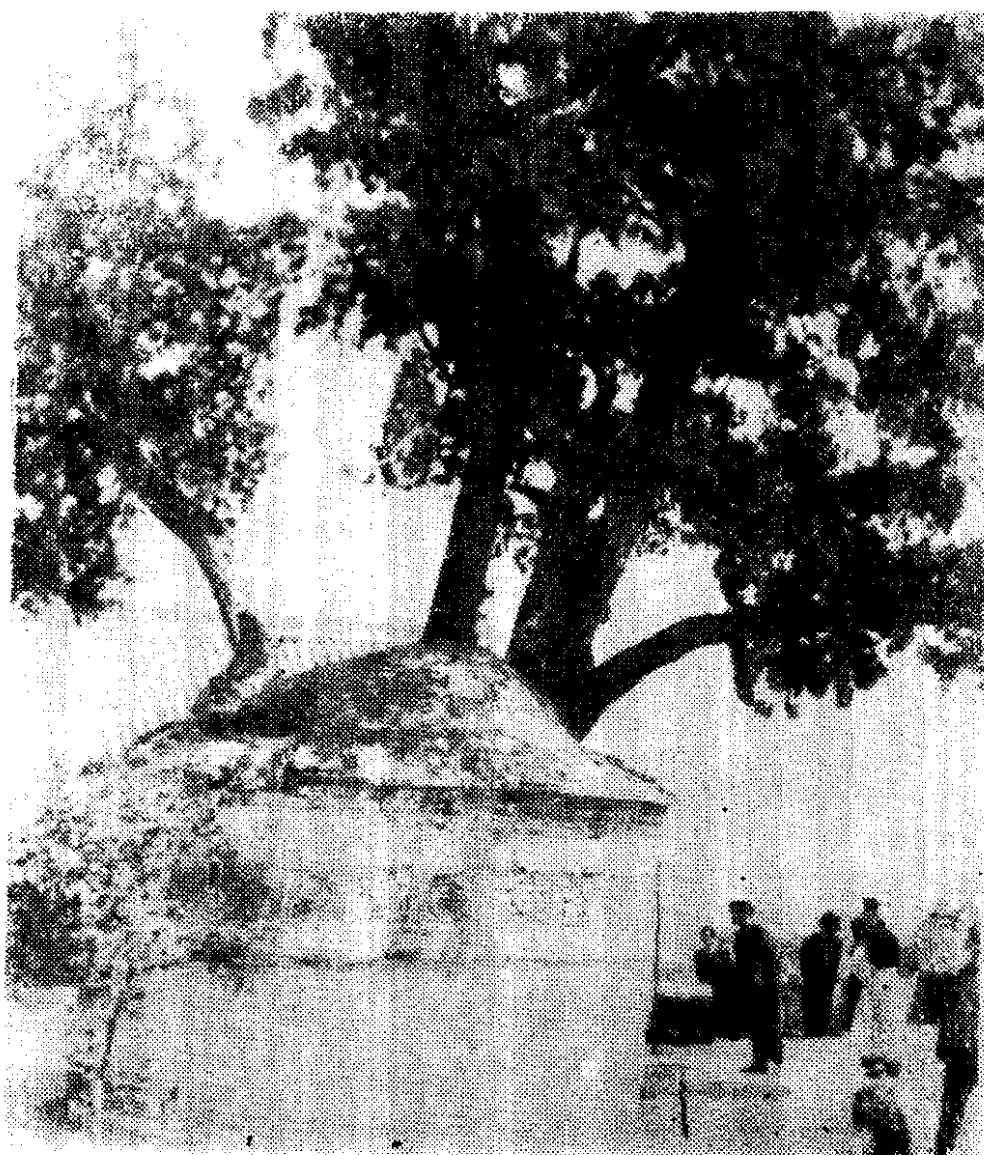
郭沫若题诗



陕西韩城太史祠前牌坊



司马迁祠全景



司马迁墓

R007118

目 录

三十五年(1951—1984)来《史记》研究述评(代序)···	(1)
第一章 司马迁生活的历史时代	(22)
第二章 司马迁的生平事迹	(35)
第一节 家世	(35)
第二节 壮游	(38)
第三节 出使	(43)
第四节 遗命	(44)
第五节 治史	(46)
第六节 忍辱	(48)
第七节 完稿	(51)
第三章 伟大的史学家	(54)
第一节 开创纪传体编纂史书的体例	(54)
第二节 创立“太史公曰”的史评形式	(70)
第三节 互见法的运用	(86)
第四节 实录精神及表现手法	(99)
第五节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135)

第四章	卓越的文学家	(164)
第一节	司马迁的文学思想	(164)
第二节	《史记》的文学艺术特色	(182)
第三节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	(199)
第五章	杰出的思想家	(218)
第一节	司马迁与诸家思想	(218)
第二节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	(279)
第三节	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299)
第四节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321)
第五节	司马迁的人才思想	(336)
第六节	司马迁的道德思想	(348)
后 记		(363)

三十五年（1951—1984）来《史记》研究述评

（代 序）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之父，他以毕生的精力写成《史记》，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以他那卓越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一代新风。司马迁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思想家，在《史记》这部巨著中，他把笔触伸向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美学、伦理道德、天文、地理等各个领域。《史记》包罗万象，是我国古代的一部“百科全书”。

—

从《史记》问世至今，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经久不衰。两千年来，我国关于《史记》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从最早论述司马迁的扬雄和评价司马迁思想的班彪，直到清代之前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三大段，即汉至唐宋古文运动之前；唐宋古文运动至元；明代。这个时期的研究资料 and 文章大概有六、七十种以上，达五、六百卷；^①（二）清代人的研究为一个时期。清代人的研究成果很大，据王重民等先生编制的《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所载，关于《史记》方面的论文有一百六十五篇以上；（三）清末（一九〇五年）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论文约有一百一十篇；（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一个时期。

^① 详见科学出版社：《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

一九五一年，翦伯赞发表了《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①一文。在文章中，翦老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一新的思想、新的方法研究《史记》，充分肯定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做出了科学的评价。他认为司马迁是一个不朽的伟大人物，他说：

不过司马迁的不朽，不仅因为他写成了一本《史记》，特别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学方法，即纪传体的历史学方法。

司马迁不朽，不仅由于他开创了这种历史学的方法，而且在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的见识之远大，首先表现在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中国以外的世界，即以世界规模研究中国历史。……其次表现于他的眼光能够投射到历史上的社会的每一个侧面。……最后而又是最重要的，是表现在他能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每一个阶级。……

司马迁的不朽，不仅由于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而且又在于他具有大胆的批判精神。他的《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纪述的历史，而是一部富有灵魂的、批判的历史。

从《史记》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在大胆地进行他的历史批判。他用锐敏的眼光，正义的观察，怀疑的精神，生动的笔致，沉重而动人的语言，纵横古今，褒贬百代。

翦老的概括十分精当、准确，分析也非常深刻、动人。另外，议论简洁明快，文字通俗，一反旧文人学者那种堆积史料和文字艰涩的毛病；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也是有意地向青少年介绍这部史学名著。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① 《中国青年》1951年，总第57期。

一篇评论《史记》的有影响的文章。

从翦老评论《史记》开始，至今三十五年，《史记》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华书局出版了新标点本《史记》和几十篇普及性的《史记》活页文选，其他出版社也出版了各种普及性的注译选本和通俗的小册子。三十五年来，也出版了一些《史记》研究的专著，如白寿彝的《史记新论》、金德建的《司马迁所见书考》、贺次君的《史记书录》、陈直的《史记新证》等。但是，真正能全面反映建国以来《史记》研究水平的，却是数量颇多的研究论文。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四年，国内上百种报刊及大专院校学报发表的论文在四百篇左右。这个数字说明了对《史记》研究的重视，也反映了我国学术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对建国以来三十五年《史记》研究的历史情况，将分三个阶段加以概略地叙述和评论。

二

如果认为司马迁诞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的话，那么，一九五五年正是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周年。因此，许多学者以纪念司马迁诞生两千一百周年为契机，纷纷撰写论文，成为新中国以来《史记》研究的第一时期。这个时期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九年，笼统地说是五十年代，实际上仅有五、六年时间，论文有七十余篇。

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这是一个老问题。五十年代，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十来篇，因涉及司马迁诞辰纪念，故谈生年的文章偏多。关于司马迁生年有六、七种说法，但在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却是两说：一是主张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一四五年；一是主张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

前三五年。一九一六年，王国维第一个考订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一九二八年，日本学者桑原鹭藏氏提出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然而，两说都是从《自序》中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推算出来的。

《历史研究》一九五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和李长之的《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对王国维的“景帝中元五年”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司马迁应生于建元六年。至于司马迁的卒年就更加缺乏直接的史料，所以比生年更加难以考订。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有人在论述。当然，考证司马迁的生卒年，这是涉及到对司马迁研究深入的问题，应该有人搞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很难做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结论。

这个时期，全国报刊及学报纷纷发表关于《史记》的文章，对宣传和普及《史记》起到了很大作用。《文史哲》杂志连续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对推动《史记》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些论文，对于司马迁的一生行事、学术思想和对祖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以及《史记》一书的内容意义、语言特点诸方面，都做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

在分析这个时期《史记》研究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端正了《史记》研究的方向。

历史科学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宣传，以激发广大人民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史记》的研究也不能脱离这个总的方向。然而，在解放以前，我国的《史记》研究者大都是沿袭“乾嘉之学”，把《史记》研究重点放在校勘、考证、读法、评注方面；其研究方法是罗列材料，引证甲说乙云，而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史记》者则是微乎其微。范文

澜、侯外庐等在自己的著述中也涉及到《史记》，但由于他们忙于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和论战，无暇对《史记》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从研究《史记》的指导思想还是研究方法，都没有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轨道。因此，成效不大。解放以后，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史记》，使《史记》研究面目一新。

过去对《史记》的研究和评价往往是侧重于司马迁发凡起例，创立纪传体史书的编纂形式。如宋代学者郑樵，他认为《史记》影响很大，“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①。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史记》的评价是：“其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者，惟创例发凡，卓见绝识”^②。这些论述是很有见解的。但是，这些封建史学家只能是从形式上做一些简单的描述，根本不可能对《史记》做出科学的评价。因为，“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过程是这种关系的根源”^③。在这个时期里，不少学者注意研究司马迁的出身、经济地位及个人遭遇，同时也注意研究了《史记》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把司马迁的写作活动与西汉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不仅揭示了司马迁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也能“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在这个时期内，有的学者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史记》，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齐思和通过《史记》与希腊史学名著的对比，指出“《史记》

① 《通志·总序》。

② 《文史通义·申郑》。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的特点在于它的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史记》“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①。

这个时期的论文从研究的重点上来看，已经不仅仅是校勘、考证、读法、评注，开始注意司马迁思想的研究。翦老的文章为《史记》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随之不少学者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也有所改变，提高对《史记》的认识。齐思和认为：“司马迁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在他这部著作规模的宏伟，和他编排的体裁，而在于他这著作的内容，它的人民性与思想性”^②。由于思想和方法上的升华和飞跃，这时期的许多论文都高度地评价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许多人认为，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

当然，这个时期《史记》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这个时期的文章大都旨在宣传和普及，因而深度不够。许多文章还是停留在一般介绍上，并无多少新意。因此，有分量的文章很少。第二，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注意的不是重复旧的东西，而是认真地在理论上发展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然而，这时期的许多学者仍在重复前人的东西，把精力放在繁琐的考证上，对《史记》研究并没有什么突破。第三，由于多数同志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史记》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个时期的主要倾向是极力美

① 《史记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它在世界史学上的贡献》，《光明日报》1956年1月19日。

② 同上。

化、拔高司马迁的思想，用今人的思想去改铸他的形象。如说司马迁的著作“充满了人民性”^①，是“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②。还有的学者称司马迁是：“人民的歌手”，“人民历史的开创者”^③，“他看透了封建社会的本质”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有待于《史记》研究的不断深入加以解决。

三

《史记》研究的第二个时期是六十年代。这个时期实际上也只有五年多时间，发表的论文约六十余篇。

这个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注意对司马迁思想的研究，从而把《史记》研究逐步引向深入。在近二十篇关于司马迁思想研究的论文中，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司马迁的思想做出全面、深入、科学的评价，当推白寿彝的《司马迁与班固》^④同题两篇文章。我认为白先生在《史记》研究方面的成就，主要有两点：第一，精辟地分析了《史记》的人民性，深刻地指出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巨大贡献。五十年代，许多学者就已经涉及到《史记》的人民性问题，但却缺乏深入的分析。白先生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史记》是一部有丰富的人民性的著作。它在处理历史重大问题上，重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影响。司马迁为《史记》规定了‘稽其成败’

① 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载《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

② 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

③ 殷孟伦：《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载《文史哲》1955年第12期。

④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人民日报》1956年1月23日。

兴坏之理’这一任务，他是以人心向背作为考察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角度的。”在文中，他以对秦汉兴亡和楚汉成败的不同认识，指出司马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史记》的人民性。秦国暴政亡于陈涉起义，这是汉初许多政治家的共同看法。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陈涉立世家，置于《孔子世家》之后，汉代诸世家之前，以表示陈涉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文中还说：“《自序》称：‘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是把陈涉作为开辟历史新时代的人物来看待的，这比贾谊等人的看法要有更丰富的意义。”

白先生还以“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为题，进行了深入地分析。他说：“通观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只是自己的工作要求，而且是提出了历史工作的中心问题。并且他作出了空前的成就，为以后的历史学者指出了途径，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此后的历史学者究竟作出了什么成绩，司马迁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和他已达到的成绩就好象是测量器一样可用以测量出它们的高低来。司马迁之所以成为中国史学的建立规模的人、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其秘密也就正在于此。”这个分析是有一定深度的。

第二，对马、班进行深入地对比研究，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旧史学家对马、班进行过对比研究。但是，他们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对比研究，因此不得要领，立论十分肤浅。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后，关于马、班之高下褒贬不一，争论不休。众所周知，刘知

几是扬班抑马的，而郑樵的翻案又太偏宕。到了清代，对于马、班的优劣、得失议论更多，大都认为马、班均为良史。清人邱逢年在《史记阐要》中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二史无所谓优劣乎？又非也。分而观之各有得失之互见，合而观之量其得失之多少，吾知其得之多者必在马，失之多者必在班。”白先生从西汉广阔的时代背景上，用纵横的比较法评价马、班史学，对传统的马、班并提的观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马、班有三点区别：第一，《汉书》不是象《史记》那样把汉的建国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虑。它反对这种作法，指责《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是把汉的历史地位压低了。第二，《汉书》抛弃了《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进步内容，而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第三，《汉书》以强调封建性代替《史记》的人民性。班固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这并没有批评倒了司马迁，反而是显示自己拥护封建的面貌。班固为了东汉政权的需要，极力美化汉家历史，抛弃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司马迁是力图摆脱神秘思想的束缚，而班固却是“抱住有神论，多方宣传有神论”，极力用迷信来解释历史。最后，白先生概括地提出：“这是封建性和人民性之政治倾向性的对立，是有神论和无神论、永恒不变和不断变化之历史观的对立。总之，这是正宗史学和异端史学的对立。”在以后的同题^①文章中，白先生又指出司马迁写《史记》是“答复历史怎样变化发展”的，而班固作《汉书》却是“答复如何维持目前的局面。”马、班史识之高下，泾渭分明，因此，马、班并举的说法，是“很不相称”的。

^① 《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